

旧锦新样

美哉,三十多年前的中英文藏书票集

胡洪侠



藏书票艺术迄今已延绵了五六百年。时下互联的新媒体早变成图文的新载体,书籍的实用功能已遭多种平台与渠道替代,纸质书阅读的小众化已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在此大变局之中,藏书票的命运又如何?

昔日爱书人总爱说,有藏书票的书就不是无家可归的;藏书票是书的身份证;藏书票是“纸上宝石”……现在看来,种种说法中唯“纸上宝石”的说法还依然有效。这要归功于藏书票本身的本事;它早就离开书籍,开始独自在世间行走、社交与展示,俨然演进成了一门拥有自己江湖的独立艺术。偶尔它们回家团聚,相互间重温一番当年出发时的初心与雄心,这就产生了以书籍样式流传的藏书票集。

我拥有的第一本藏书票集

我拥有的第一本藏书票集是港版《国际藏书票精选》。前几天翻出这本书,发现外封套早经众银色盘踞多时,如今孔洞森列,斑斑点点,虫痕纵横,大有篆意,俨然一页“蠹书序跋”。只可惜它们说了些什么,我等无从知晓。

此书由香港藏书票协会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1年10月香港第1次印刷。大十六开,精装,厚纸彩印,收录290枚藏书票图。内封面贴有一张古元藏书票,方寸画面间,海阔天空,船帆竞发,群鸥翔集。有人曾说手工粘贴在此的这枚古元先生自用书票乃是“原票”,我起初也曾相信。但向宁成春先生求证。“不可能,”宁老师说,“不可能把古元的原版票弄来,那太珍贵了,一张真票可能比一本画册还要贵。”

我相信宁老师说的,因为当年他是这本画册的责任编辑。2022年和宁老师在深圳再次见面时,我曾拿此书让他签名,他说,三十年前在香港做这本书,太有意思了;书名是请饶宗颐先生题签;装帧设计由当时还年轻的陆智昌操刀,那时内地还没几个人知道他;书票是从一千多张作品中选出来的,印制时不论选材还是技术都很先进、很讲究,书出来很快就获了印制大奖:“你需要找很多人在这本书上签名。”

“太不容易了,”我小心合上这本作品质量与设计印制精美程度皆前所未见的中英文藏书票集说,“饶公已经仙逝了。”

宁老师说的大奖,全称是香港市政局“1991年度香港最佳印制书籍奖”中文组和英文组总冠军。当然,1993年我与此书相遇时并不知它的出身,只是第一眼看上去它的“颜值”相当特别,和同时摆在玻璃柜的其他书迥然不同,有“国际范儿”,通体散发洋气。我曾专为此写过一则“微书话”:

香港三联1991年版《国际藏书票精选》,是我在广州三联买的。第一次见到时嫌书价太贵,丢下没买。过了半年再去看来,书价竟然涨了一百多,真是见了鬼了。没办法,痛下杀手,“婆媳回家”。印制极精美,曾获亚洲书籍设计金奖,设计者为宁成春。扉页还贴有古元自制藏书票一枚,怪不得定价一个劲地乱涨。

藏书票作为小众艺术在香港坚韧地存活下来

从眼下视角回望,1990年代是一个何等崇尚国际化的年代,也是我们这些尚未路出国境的人一见“国际”二字就莫名心动的年代。彼时的藏书票艺术,倒是比经济乃至文化众多领域都更早实现了国际化。这大概得益于藏书票艺术有天然的“全球”基因;它诞生自德国,盛行于欧美,传入东方也有超过百年历史。17世纪开始,国与国藏书票机构之间收藏和交换藏书票就已经成为时尚。藏书票在中国的兴起是在1930年代,到了1984年,中国终于也有了第一个藏书票研究会。1986年,中国首届藏书票展在北京举办。1990年德国威斯巴登州举行第23届国际藏书票展,中国就有5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到日本札幌举行第24届国际藏书票展时,中国参展的艺术家已达百余人。

这本港版《国际藏书票精选》收入的则是从1991年香港国际藏书票展千余件参展作品中选出的290幅,其中入选画师图录的内地参展艺术家也有28人,包括了古元、李桦、李平凡、杨可扬、梁栋等一众名将。多少年后很多内地版画家回顾自己的艺术道路,都会把参加香港国际藏书票展或作品收入《国际藏书票精选》写入简历,证明自己早就走向了世界。

是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也一度是大中华地区藏书票的博览交易中心。1991年10月,国际藏书票展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参展的两百多位作者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或地区。

主办此次展览的香港藏书票协会,则是1989年12月成立的。共创此协会的本港艺术家陈法兴、郑大戈、蔡金章、许晴野、许朝英、熊美仪、熊爱仪、黄俊如、余元康等都有作品参加展览与入选票集。查网上资料可知,这个协会至今依然活跃,年年都会举办各类藏书票展览及书票艺术进学校、社区和图书馆一类活动。相比之下,深圳藏书票界也曾借毗邻香港之便活跃过几年,近些年似乎无声无息了(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也未可知)。

藏书票作为小众艺术,在香港这样一座国际化城市里能坚韧地存活下来,是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或许这还是要拜香港文化的国际与多元所赐,但也与几十年间多位文化名家的力倡力行有关。1962年,唐弢先生在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一书,其中收有《藏书票》一文。文章在介绍了藏书票的起源、样式、风格、制作与使用方法后说,中国人积习相沿,喜用藏书印,“只记得郁达夫、叶灵凤两位有藏书票,叶灵凤且为藏书票收藏者之一”。

彼时叶灵凤先生正在香港,读了唐先生的文章,即于1962年9月13日在香港《新晚报》发表了一篇《藏书票与我》,接着唐文的话头说,他还设计过一张藏书票,“采用的是汉砖上的图案,是一只凤,我将它加工,变得更繁复一点,……印了几千张,试贴了几本书……”他说他对藏书票的兴趣来自于日本杂志,且曾写信向研究藏书票的大家斋藤昌三求购过《藏书票之话》。他还应斋藤昌三的要求将自己的藏书票寄去日本,换回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还被日本同道在会员刊物上誉为“在中国的唯一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

叶先生说的都是1930年代的事,彼时他是不是搜集藏书票的“中国唯一”先按下不表,至少在他写文章的时候,在香港,他大概是唯一设计过、搜藏过、传播过藏书票的藏书家,是懂藏书票文化最深的作家。在他之后,香港一带爱书人和藏书家就开始谈论藏书票了。这里略举数例。

黄俊东先生的《猎书小记》中有一篇《藏书票之话》,其中说到1970年代初叶灵凤先生曾有意在香港开一次藏书票展览会,后不知何故而作罢。“1975年11月21日叶先生不幸病逝,藏书票展览会更是遥遥无期了。”他还谈到自己收集藏书票专书的甘苦,讲述了久觅不得又终于喜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故事,详细介绍了此书的装帧、设计、内容、插图诸方面,喜悦与宝爱的心情溢于言表。

仿佛是在窥视私人相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伦敦玩藏书票的人也不多。一部《雷克斯·惠斯勒藏书票印记设计图样》,出版人共印1000册,其中350册扉页上贴赠一张原版票,定价比另外650册贵一倍。这和前述宁成春老师的说法相当一致了:如果港三联版《国际藏书票精选》内封面上贴了古元先生原票,价格就不知变成什么样了。起码我敢保证我手中这本书中的贴票,是假如包换的大批量印制票。

即使如此,《国际藏书票精选》一书能在1991年于香港问世,仍然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彼时中文藏书票专书实在不多,内地出版物我藏有李平凡先生1986年编的一本《日本版画藏书票选集》(人民美术版)。香港出版物我有梅创基《纸上宝石:版画藏书票》一书。香港藏书票协会成立后还曾于1990年编过一本《香港藏书票协会会员作品集》。至于台湾吴兴文先生藏书票系列专书的出版就都在1991年之后了。

自书籍之美角度观之,《国际藏书票精选》可谓遥遥领先。此书正文页面先印深色底纹,再将彩色藏书票印于其上,随手翻开任何一页,都感觉仿佛是在窥视私人相册。此书的精装加平装双封面设计与装订,也成了几年后宁成春先生在北京整体设计豪华典藏版《莎士比亚画廊》时的灵感来源。



作者胡洪侠系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以读书、藏书、写书为乐。1992年南下深圳,1995年创办《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2006年创办“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是中国读书界最重要的评选活动之一。现任深圳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编辑委员会副总编辑,兼《晶报》总编辑。

新作述评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从19世纪的翰林到20世纪的出版家

在创作完成近40年后,叶宋曼瑛女士《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一书的简体中文版在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最早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先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英文版、繁体字版。

本书作者是新西兰华人作家叶宋曼瑛女士,其1945年生于香港,1974年定居新西兰,现为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新西兰最高级别学术荣誉),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院教授,华侨大学名誉教授,兼任香港大学、墨尔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研究员。

张元济,字菊生,1867年出生于广东,祖籍浙江海盐,祖上以科举考试成就、珍本古籍藏书而闻名。同其他士大夫子弟一样,张元济一度以科举为天职,其科举入仕之路可谓顺遂:1889年,与梁启超同年中举;1892年中进士,与蔡元培一道授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入刑部任主事,后出任总理衙门章京。总理衙门章京是晚清时期处理清廷对外事务的官方机构,接触的是“外国的”“西方的”“新的”的事物。戊戌变法时期,张元济作为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与康有为一同为光绪皇帝召见。变法失败后,其被下旨革职“永不叙用”,从此离开京城,不再涉足官场,投身当时在上海的、小小的商务印书馆,从一名十九世纪的翰林化身为二十世纪的出版家。

用作者的话说,张元济走的路,“是传播各种知识以救中国;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一具体的路径,在《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一书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

当张元济把出版业变成终身事业,并将商务印书馆发展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社时,他实际上还是在实践同一个目标——传播现代思想和启迪民智。商务印书馆发行了许多教育书籍、参考书以及与教育方法理论有关的书籍,最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有自己的编译所,后来还建立东方图书馆,成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心之一。张元济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对编辑、发行、经营都是亲力亲为。

张元济的一生,呈现了一个有远见、非墨守成规和开明的学者形象,他一方面紧紧地恪守儒家的基本道德信条,另一方面却并非僵化、保守到一见新思想、新哲学就马上抵制。他虽身为翰林,却从不会看不起学识和资历较浅的人。在《妈妈的星星》:

定格一个成熟的灵魂

罹患孤独症的儿童,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作家雪漠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妈妈的星星》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探入“星星孩子”的孤独宇宙,书写一对母子如何面对家庭变故,如何走过漫长的疗愈过程,如何治愈身心的封闭、疏离、恐惧和不安,如何学会与外部世界、不同人群和谐共处……小说主人公星星和他的妈妈云子都有现实生活原型,他们在共同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用信件倾诉,用阅读陪伴,用爱和智慧点亮心灯,从而走出暗夜,走向光明。

《妈妈的星星》是一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它有现实中的人物原型,有些故事也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但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将“孤独症”上升为一种生存状态:人们习惯了自说自话,彼此之间缺乏包容和理解。在作者笔下,“孤独症”不仅是生活中的案例,也是人与人之间隔阂的一种象征。而《妈妈的星星》这部作品,正是希望通过描绘孤独症孩子与母亲之间爱的救赎故事,打破这种无形的壁垒。在作者看来,救赎其实很简单,简单到仅仅学会说“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我爱你”这几句平常的话。它看似普通,却能沟通人类所有情感,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换言之,《妈妈的星星》以文学的形式传递爱的理念,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唤起人们对爱的重新认识,学会用心去爱世界、爱他人、爱家庭、爱一切,用爱融化孤独,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与此同时,该书也着重强调了尊严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故事原型“云子”在孩子被前夫带走、自己陷入极度困境时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用信件与孩子沟通。每一封信都饱含着她对孩子深深的爱,在传递母爱的同时,也维护了双方的尊严。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尊严的缺失是导致很多孩子出现抑郁和孤独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作者通过小说中的情节,生动展现了如何以艺术的形式赋予人的尊严,让人重新找回自我、重拾生活信心的过程。

在通过艺术寻回尊严的过程中,作者借助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定格了一个成熟的灵魂。这个成熟的灵魂,不仅能够淡然面对命运带来的苦难,还要有一种智慧,能够自主选择如何面对这些苦难,以及从苦难中获得什么;这个成熟的灵魂,总能主动在自己的人生剧本中拥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而非被动地等待既定情节的发生;这个成熟的灵魂,在面对生命中的各种境遇时,都能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接纳和消化,始终保持宁静和恬淡,像一朵雪中的梅花那样淡淡地活着。正如作者所言:“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灵魂,那么无论面对什么事,他都能像清风拂面那样放下,不会有太大的烦恼。我们这个充满各种烦恼的社会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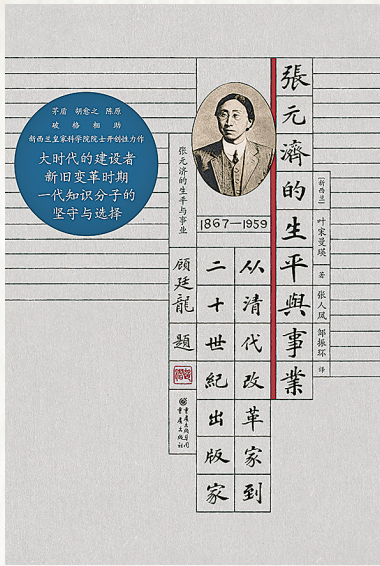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图

只有野鸟翻飞
和枯枝的掌声
那天,我眼前这位从上海来贵州
又从贵州回到上海的第一代航天人
第一代“三线人”
影子升高,托住
我站立的沙子坡

正是因为贵州的“三线建设”点多线长,也就有来自全国的十万大军奔赴火热的贵州,让贵州那片红色的土地更红、红色文化更艳。

诗歌是文学的桂冠,是天上的星辰,是林间的百灵鸟,也是时代的记录者、文化的传播者。“以诗入史”是中国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希望更多的诗人和作家像杨杰一样,去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为发掘“三线建设”历史、弘扬“三线建设”精神贡献力量。

我读到她讴歌的92岁的第一代“三线人”时,镜头感十足:
威老捧起一捧泥土
威老说,要把这里的泥土带回去
带到“两弹一星”事迹馆
那天,初冬的山上没有酒



那个时代,张元济被公认为是藏书家和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对善本书的追求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他于1919年就开始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张元济为赴欧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聘请他们去商务印书馆工作。从中国新式学校毕业的年轻学生也同样受到欢迎,并按工作成绩给予晋升,于是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中出现陈独秀、茅盾和郑振铎的名字就不足为怪了。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一书通过张元济的生平,展现了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张元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图



中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而非被动地等待既定情节的发生;这个成熟的灵魂,在面对生命中的各种境遇时,都能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接纳和消化,始终保持宁静和恬淡,像一朵雪中的梅花那样淡淡地活着。正如作者所言:“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灵魂,那么无论面对什么事,他都能像清风拂面那样放下,不会有太大的烦恼。我们这个充满各种烦恼的社会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图



只有野鸟翻飞
和枯枝的掌声
那天,我眼前这位从上海来贵州
又从贵州回到上海的第一代航天人
第一代“三线人”
影子升高,托住
我站立的沙子坡

正是因为贵州的“三线建设”点多线长,也就有来自全国的十万大军奔赴火热的贵州,让贵州那片红色的土地更红、红色文化更艳。

诗歌是文学的桂冠,是天上的星辰,是林间的百灵鸟,也是时代的记录者、文化的传播者。“以诗入史”是中国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希望更多的诗人和作家像杨杰一样,去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为发掘“三线建设”历史、弘扬“三线建设”精神贡献力量。

武力